

● 相关文献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绩考核...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定量指标...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模式...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平台...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才强国...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技创新...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
-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研究文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调控机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调控机理

作者: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出处: 中国网

促进经济增长是“神秘四角”精准调控的动力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计划、按比例”成为耳熟能详的口号，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注重设置产品产量等具体指标。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探索，特别是随着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进一步调整并逐渐完善。1993年，提出了八大主要目标：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财政、外贸进出口和外汇储备、商品零售、物价、经济效益及人口自然增长率。

经数次调整，1997年宏观调控八大目标确定为：（1）经济增长率，（2）固定资产投资，（3）价格，（4）财政收支差额，（5）货币发行量，（6）外贸进出口总额，（7）人口自然增长率，（8）城镇登记失业率。1998年以后，这八个目标的体系被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确定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它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定位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明确为四个基本目标，国际上也统称为经济宏观调控的“神秘四角”：

一是内涵丰富，覆盖面广。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减最终会体现到经济增长的变化上来。增加就业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这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稳定物价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一般都会引致物价的变动。国际收支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随着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外部平衡，可以为内部平衡（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是借鉴了国际经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效率、稳定和公平三个问题上。由于通货膨胀（或紧缩）、失业以及国际收支失衡，都会导致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是造成经济不平等、导致影响稳定和公平问题的原因。因此，为履行好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责，各国基本上都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列入基本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三是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四个基本目标更具宏观性、战略性，是第一层次的目标，把它们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国家计划的着眼点将更加集中到抓大事、谋大局、促发展上来。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宏观调控在面对诸多挑战的严峻形势下，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而逐步得以丰富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果断对当时“过热”的经济全面进行治理整顿，使我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达12%。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继而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经过3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由于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对此，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地做出以扩大内需为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了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大幅下滑局面。整个“九五”时期，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内生

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8.3%，2001年是“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仍然达到7.3%，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8%，200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9.9%。尽管SARS疫情一度使2003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整个上半年GDP增长仍然处在8.2%的较高位，预计2003年将达到8.5%。从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13年来我国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初步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宏观调控突出了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鲜明特点，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是“神秘四角”精准调控的动力基础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确定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其中，“促进经济增长居于四大目标之首。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但是经济增长是实现发展的基础。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不论是发展中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地区，最大的矛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第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以及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千方百计地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依靠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今后15年我们有充分条件继续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

1、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过去20多年的增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的特征。第一，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总量还是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一是经济总量从一位数跃升到两位数，上了一个新台阶。2002年整个经济的总量达到了10.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人均GDP也第一次接近1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起飞时期。二是就经济发展的速度看，目前中国经济也正进入一个新增长时期的上升阶段。2001年GDP增长7.5%，2002年增长8%，今年一季度增长9.9%。尽管SARS疫情一度使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整个上半年GDP增长仍然处在8.2%的较高位。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已经发生变化，市场机制日趋完善，这表现在市场准入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政府管制的进一步宽松，投、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改进，法律环境的进一步健全，以及市场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要素的流转更加快速、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市场活力对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牵引越来越强劲。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将依托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不断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带来新的活力。从产业的角度讲，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已经开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电子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这样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还将继续。从区域角度讲。一方面，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为中心的高增长区域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加大，其中部分地区的产业集群已逐渐形成，有些已趋于成熟，区域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复兴计划正在给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第四，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内市场，而应是一个全球市场。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市场竞争将逐步淡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界限，而一切相关政策的制定也要同时考虑国内外形势，包括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机遇和压力。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展观念已经确立。从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财富增加和经济机能优化，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健康有效的均衡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加注重全面把握宏观调控的各项目标，更加注重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已成为全国的共识。

2、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都是客观的存在。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长波）规律的角度来判断，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阶段，在未来的10~20时间内，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有效需求、充分就业，物价指数等宏观调控指标总体上呈现好转态势。经济长波是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规律。一般认为，技术革新是经济长波的主要起因（熊彼特，1942）。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纺织机，蒸汽机和钢铁生产，电力、化工和汽车等大的创新（技术革新）引起过三次大的经济长波。重大的技术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其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下降，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更新的大创新出现，便进入下一个经济长波。工业发达国家经济长波大约50~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短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在一个经济长波内，会有几个中波（中周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陈东琪等人根据我国经济主导产业的转换时间表，认为自19世纪80~90年代，到1980年，我国经历了三个长波，平均周期36年。1980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第四个长波，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到2002年，是我国经济长波下降阶段。十分可喜的是，自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保持长时间的强势增长，2003年第三季度GDP增幅超过9%，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30%以上，2003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和贷款总额分别增长20.7%和23.7%。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经济长时期实施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从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来看，2002年下半年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了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阶段，在这一轮经济长波中，主导产业将是汽车、电子和住宅产业。2003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做出总体判断，认为2002年以来，随着我国国内需求增长活力的逐渐显现和入世效应的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开始走出调整型增长阶段的紧运行区，过渡到宽运行区或强势区，并逐步向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转折。2003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周期，转而步入经济快速上升轨道，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黄金增长周期已经拉开序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等人认为，21世纪初，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来自于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时代、以电子通信产业为主的新经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国际经济合作机会这四个方面。

3、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分析

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7~8%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莱因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连续40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在未来20年里，并非没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是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有起伏，由于国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有时增速会在6~7%左右，而不是8~10%。高盛（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首先，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按汇率折算刚刚达到1000美元，按购买力评估法折算也仅有4000到6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其次，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中国的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改造、住房消费等将长期拉动投资增长。第三，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第四，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审慎有效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第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外向型经济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并且认为未来20年，生产力的提高将代替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花旗集团所属花旗环球金融（原所罗门·美邦）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近日在其最新发布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将维持在7.5%左右水平，并预测这一水平将在未来10年内得以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基础和动力等各方面因素来看，中国以7~8%的高速保持近半个世纪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基本理由有以下九个方面：一是中国已拥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三是中国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四是中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五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我们已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六是中国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七是科教兴国战略将为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八是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九是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在新的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逐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对未来

中国经济增长乐观预测，认为未来15年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内在因素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中国的经济仍将保持7%以上速度增长。其基本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物质要素的供给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交通、水利、通讯、能源等的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物质要素的丰富将为经济增长推波助澜。到2002年底我国高速公路已经达到2.52万公里，世界排名第二。二是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中国有7亿劳动力，且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供给十分充裕。另外，整个国家向信息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还将全面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三是在资本积累方面。中国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空前雄厚的程度。民间金融资本已经达到12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也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邱晓华认为，“资本扩张已经长期维持高增长水平，继续以此为主推动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难度。”今后要尽快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把资金投到更需要投入的地方。四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未来15年，投资、消费和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将发生变化，“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将从现在的40%下降到30%左右”。未来几年，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从整体趋势上看，增长势头会有所减弱。而与此相对应，未来15年，居民收入有所增加、消费环境不断改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将导致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明显增加，“平均贡献率将从50%上升至60%”。外贸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会保持相对的平衡。从趋势来看，随着中国进口的大规模增加，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减小。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在今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工业对经济成长的拉动作用还会明显增强，“贡献份额将超过60%”。经过近几年的飞速发展后，传统的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在未来15年的发展会相对平稳，但新兴服务业将加速成长，贡献率将逐步上升到35%以上。农业增长的速度将继续相对平缓，对经济贡献的份额将从现在的4%至5%下降至3%左右，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将继续增强。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作出判断，认为“十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达到7.5%左右。未来15年，可以实现7%或略高一点的“较快增长”。按照邓小平同志“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未来50年的中国经济，仍应保持“较快增长”的速度。如果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定义为人均GDP12000美元左右，人均GDP要比现在的800美元左右增长大约14倍，而改革时期20年人均GDP只增长了约两倍，即使考虑到2030年人口增长出现明显下降从而使人均GDP增长加快，也不会根本改变2000年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按不变汇率算，2020年要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需要年均递增7.5%左右，要达到5000美元，则需8%以上的速度，如果取这两个方案的均值，到2015年，人均GDP大约在2600~3100美元的区间内，这是一个较稳妥的增长方案。同时，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宜低于6%这样一个心理防线，低于6%，会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因为“十五”和2006~2015年期间的劳动力分别以1.2%和0.8%的速度增长，要实现相对充分就业，必须要求国民经济有7%左右的“较快增长”来保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等认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其中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0%~7.9%；而在2011年至2020年间，这一速度将降至5.5%~6.6%之间。认为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前10年，资本的快速积累、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后10年，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由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下降，此二者将导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比前10年下降1.3~1.4个百分点。若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到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汇率计算，中国GDP将由2000年的10645亿美元提高到41970亿美元，人均GDP将由2000年的840美元提高到2850.7美元。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假设年通货膨胀率为2%），到2020年，按汇率换算，中国的人均GDP可达4236美元。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预测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在8%~10%。供给政策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所以更为重要。吴敬琏认为，虽然外部环境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也不能确定外部条件到底有什么、有多少强度的变化，但多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因素可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在近期，也许是5年或10年的范围，如果环境较正常，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9%甚至10%。要强化供给政策推进经济改革，如果做好各项配套工作，经济增长至少会是7.5%~8%。

增加就业是“神秘四角”精准调控的民生要义

（节选）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物价指数平稳、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充分就业成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优先指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0年人口总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总劳动力人口约占世界总劳动力人口的26%，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约占世

界总老龄人口的20%。而且在未来20~30年中,人口总量高峰、劳动力就业高峰和社会老龄化高峰相继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历届政府始终需要优先重点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和养老问题三个基本问题,尤其是为占世界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群众的利益是具体的,只有通过就业,一个人才能获得收入、安居乐业、实现价值,社会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也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只有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才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就难以深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难以推进,各项发展规划和措施就难以落实,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预期实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高度重视,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将“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这是中央做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和长远意义的决策。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这项工作一拖延,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业工作不能拖延,再就业工作更是拖不起。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约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员近800万人。3项合计,今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人。而我国全年只能新增就业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约1000万人,供大于求的差额在140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1.5亿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不能拖、不能靠、不能等。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之所以具有长期性,是因为这项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彻底解决的,它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总量增至16亿,达到历史最高峰。在此过程中,就业压力将始终存在。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力在逐渐减弱,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必然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迁,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都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1、目前我国就业的总体形势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就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经过调整,不断趋于合理。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将控制失业率列入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合理调整就业结构,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大力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总体上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2002年底,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3740万人,比1990年增加899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达到24780万人,增加7739万人。特别是1998~2002年5年间,国有企业累计2700万名下岗职工中,有180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达到66.5%。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and 城镇化进程加快,就业结构发生积极的变化,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初步形成,就业方式日益灵活多样,在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比较平稳地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劳动力的大流动,保持了全国就业和再就业局势的相对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1998年末,全国从业人员达69957万人,比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了2980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90万人,年均递增2.8%;其中城镇从业人员20678万人,比1978年的9514万人增加1116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58万人,年均递增4%。在全国从业人员中,占46.6%。全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10044万人,比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2593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由78.3%,下降到1998年的48.6%。全国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等其他经济单位职工1812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84年的0.3%上升到1998年的8.8%。

自90年代以后,其他经济单位职工迅速增加,1998年比上年增加727万人;全国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为3232万人,比1978年的15万人增加了321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0万人,年均递增30.8%,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0.6%猛增到5.6%,1998年比上年增加了563万人。其他经济单位和私营个体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就业结构方面,从1980年到1998年,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比重由69.9%下降为49.8%,第二产业由18.5%增长到23.5%,第三产业由12.6%上升为26.7%。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变动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较快,表明产业间的就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化。

2001年年底,全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73025万人,与上年同比增加940万人。第一产业为36513万人,占50.0%;第二产业为16284万人,占22.3%;第三产业为20228万人,占27.7%。城镇就业人员为23940万人,与上年同比增加789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1166万人,比上年减少447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人数10792万人,比上年减少467万人;其中,国有单位7640万人,城镇集体单位1291万人,其他单位2235万人。其中,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3658万,比上年增加254万人。2001到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就业总量继续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改善。2002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737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36870万人,占50.0%;第二产业15780万人,占21.4%;第三产业21090万人,占28.6%。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4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8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81万人;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426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9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1055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34万人。2002年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

到2001年底,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51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42万人。90%以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全年共有227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30.6%。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继续得到保障。2002年末,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410万人,比2001年末减少105万人。绝大多数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全年120万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26.2%。

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初步建成,到2002年年末,90个城市实现了市区内实时联网,并实现按季度发布职业供求分析报告。劳动力市场秩序逐步规范。2002年年末全国各类职业介绍机构26158所,全年介绍成功1354万人次,比上年增加125万人次,增长10.2%。其中劳动保障部门办职业介绍机构18010所,全年介绍成功978万人次。

职业培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2年年末全国技工学校3075所,在校学生153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13.3%;面向社会开展培训和再培训20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7.6%。就业训练中心3465所,社会培训机构17350所,全年开展培训107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2.7%。技校和培训机构培训的人员中,518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参加了再就业培训,31万人参加了创业培训,110万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了劳动预备制培训。

失业保险的作用进一步增强。2002年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4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8万人。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215.6亿元,支出186.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3%和18.9%。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018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73万人。

2、当前我国就业与再就业存在的主要矛盾

失业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难题,2002年,全世界有1.8亿人失业,另外有10亿人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把就业置于优先的地位。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周期性的,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或负增长。我国的失业问题与这些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是在二元经济转换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失业率加快攀升,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面临十分突出的矛盾。1996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0%,1997~2000年一直保持在3.1%,2001年上升到3.6%,2002年升至4.0%。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在逐年加快。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五城市所作的调查,1996年9月以来,五城市16~60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而且在持续升高。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甚至超过了14%。当前我国就业与再就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性矛盾、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总量性矛盾。劳动力总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一直是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造成我国劳动力总供给增长过快,即有中国人口总量自然增长造成的劳动力总人口的增长,也存在明显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首先,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000万人。根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2001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70%计算,2001年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近1000万人。“十五”期间,我国新生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升至峰值,达到4650万人。1998~2000年期间我国净增劳动力就业人数(指新生就业劳动力减去退出劳动力)1193万人,平均每年只有400万人。其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释放出大量劳动力。1992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传统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向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转变。农村劳动力不再局限于离土不离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劳动力供给急剧增长;二是刚性就业向柔性就业转变。随着“按需设

“铁饭碗”被打破，国企和城镇其他企业中的富余人员被大量分流，加入失业和待业队伍。这两方面的转变使计划经济体制下潜藏和累积的就业压力渐次释放出来，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第三，我国劳动力参与率长期偏高，总体上也增加了劳动力的总供给。劳动力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比率。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与就业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保持合理的劳动力参与率，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庞大的农业劳动力，使我国整体上享受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的水平降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因为缺少社会保障而滞留在经济活动人口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青少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低，而较早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高了总体劳动参与率，使我国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适龄人口较早转化为经济活动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总量。1997年，我国大陆劳动力参与率为83.5%，而同期中国台湾省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8.35%，中国香港地区是73.0%，美国是75.25%，巴西是68.0%，印度是75.3%。

我国劳动力需求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就业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两个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是通过保持比较高的经济速度，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1980~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2。在“八五”期间（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12.0%，就业增长率降至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九五”（1996~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为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0.1。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一直在0.1左右，其中，有些年份达到了0.12。据有关测算，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创造240万个岗位，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岗位。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这与一段时间以来过多地强调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升级，使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提高，如，1985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固定资产净值7260元，1990年为13552元，1995年38622元，2000年提高到93162元，在重工业领域更为突出，从1995年45258元猛增到2000年的59550元。一般而言，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业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考虑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进一步深入，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特别是第三产业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因素将会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有所增高。如果将未来我国就业弹性系数设定为0.13，根据国内外权威组织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宏观预测结果，2000年~2006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在7.0~8.0%之间。按我国就业弹性系数设为0.13、GDP年均增长率为7.0%和8.0%两种方案，对我国未来劳动力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状况进行预测。

二是结构性矛盾。当前扩大就业的难点，除了总量矛盾之外，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首先，就业的产业结构矛盾。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过早排斥就业，而第三产业是进入壁垒最多的行业，极大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扩大就业作用的充分发挥，形成了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由于内需不足，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特别是纺织、机械、煤炭、冶金、森林、军工等传统行业 and 资源型产业的衰退，造成就业大幅度减少。而新兴产业发育不足，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岗位，使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从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转变为排斥就业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由于体制、政策和观念等方面的约束，使得其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总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与世界上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十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差距更大。

其次，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矛盾。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所占国家经济总体的比重逐步减小，国有大中型企业大规模减员，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一个新的阵地。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大量中小企业发展受多方面制度和政策方面约束，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所有制矛盾。国有企业大规模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新增就业岗位主要依赖于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据统计，1991年~2000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4658万，而国有企业减少就业岗位2244万，集体企业减少2049万。但是，目前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是自发性结果，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而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政策上，与外企、国企待遇不平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在经营环境方面，承受乱收费等较高的经营成本。

第三，就业的区域性矛盾。我国资源型产业、传统制造业及国有经济在地域上的集中，而跨行政区域的就业又受到许多局限，形成就业的区域性矛盾。我国传统制造业和国有经济布局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在地域上集中，形成传统工业、

有企业的密集区。由于资源枯竭、传统产业衰退、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的资源性、结构性、体制性失业，集中在地区上形成突出的区域性矛盾，使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大，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辽宁、黑龙江、四川、重庆、湖北、陕西等省份的就业压力大，而浙江、福建、江苏等省份的就业压力相对较小。

第四，就业的素质矛盾。科技进步、技术更新、新兴产业兴起，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素质科技和文化较低、或技术单一的劳动者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失业或难以就业，与此同时，一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工工人又不能满足甚至后继无人。据统计，在全国7000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而高级工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工程师技术人员则明显不足。大量失业和待业的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

3、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积极的就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就业与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决定》强调，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都要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从扩大再就业的要求出发，要做到四个“注重”，即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这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积极的就业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总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基础和条件。从最近十几年我国的实践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大约可增加70万~100万个就业岗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5%以下时，失业人员就会明显增多。因此，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根本保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发行建设国债8000亿元，带动数万亿元社会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持续增长。1998~2002年国债项目投资每年带动经济增长1.5~2.0个百分点，直接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因此，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扩大就业和减少失业的根本之策。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实际增长速度仍然低于潜在的增长能力。到去年底，居民本外币储蓄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每年吸引外资在500亿美元左右。但银行总体上出现存差，资本的利用率不高，资本的产出率也不高。加上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应该说，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是存在的。近几年，以住房、家用轿车、计算机、通讯设备、教育为代表的城镇消费热点逐渐出现，合理的消费结构正在形成。长期困扰经济发展，制约市场需求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开拓农村广阔市场已成为共识。只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加快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疏通投融资渠道，中国经济是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的创业与就业能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我国人口的科技素质和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加快速度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把我国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过程。世界上一些人口密度同我国相当甚至还要大的国家，以及我国一些人口稠密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比较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结合建立学习型社会和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有针对性、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地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使劳动者尽快就业、再就业和稳定就业。一是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重点由保障基本生活转为鼓励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二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对职工开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培训，提高本职工作、革新创造和转岗能力。三是开展城乡初高中毕业生职业培训，加强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是发展现代远程教育，面向西部和广大农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和职业资格培训。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发展：不同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是不同的，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

面，我们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在吸纳劳动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根据统计，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5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和缓慢，1990~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3%，而第三产业增长仅为8.4%。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占70%左右的水平；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为28.6%，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0~75%，即使是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也大多在40~50%。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争取到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0%，从业人员比重提高到45%。与此同时，加快发展中小企业，有效扩大就业途径。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就业人口占75%。实践证明，凡是企业多而且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业压力就小；而大企业多，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地区，就业压力就大。现阶段关键的问题是要为中小企业的创业提供必要的条件，放宽限制，简化手续，减轻负担，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同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新创立的中小企业，如果新增就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在给定的期限内减免所得税、营业税。各地根据本地制定就业援助计划，预算单列资金，对于雇用下岗职工的，可给予贷款担保和贴息补助等政策优惠。要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就业方面的作用。我国已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且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2001年底，城镇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经济吸纳的就业人员达到9500多万人，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40%。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使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投融资、土地使用权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它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消除体制性障碍，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鼓励有条件企业做强做大，使非公有制经济更快更健康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四，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扶持政策体系、法律体系。深化劳动人事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引导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有序流动，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要针对目前就业中面临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有益经验，总结各地区一些成功的做法，制定我国的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探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服务，推动民营职业介绍机构的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多方式搜集、分析和利用信息。对就业和再就业人员实行“一站式”、“个性化”的就业服务。如为就业人员进行市场、政策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创业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对兴办企业实行几年的免税孵化期，利用有财政拨款的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对失业人员免费开展技能培训等。应尽快制定和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使就业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建立一支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形成功能齐全、流程规范、方式灵活、运作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法制健全、运行规范、竞争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周到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底线。要积极筹措社保基金。对于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企业就业的各类职工，都应该创造条件，进入社保覆盖范围，企业和个人按规定的标准缴纳社会保障金，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现阶段，国家和地方财政都要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于非自愿失业人员的保险和救助，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第五，突破传统就业模式，倡导自主灵活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是指在正规形式就业之外的其他就业形式，主要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多种灵活就业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是对传统就业模式的一次深层次的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它适应了企业科学经营、人们更新知识、职业流动、照顾家庭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的需求。日本政府在第九个雇用对策基本计划（2001~2010年）中提出：“通过推进非全日制就业，家庭就业及扩大派遣就业领域等就业政策的实施，使多种灵活就业得以顺利发展”；美国劳工部在1999年《美国劳动力报告》中指出：灵活就业满足了产品和服务要求的劳动力调整，和不灵活的人力资源政策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国外政府的肯定、支持态度是今后灵活就业发展的动力。另外，据英国剑桥计量经济学咨询公司研究推测，到2010年，英国1/3的工作将是非全日制，未来10年，大多数新创就业机会几乎都是非全日制；欧盟各国周工时在1~31小时的劳动者总数1995年为2960万、2000年为3400万。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4100万；另据国际远程就业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1999年美国远程就业劳动者为1570万,2000年增至3000万,预测到2010年则可达到4000万;1999年欧盟15国远程就业劳动者总数为145万,预测到2004年可达到3000万,但比美国提前三年,即在2007年可突破4000万。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社区服务人员,约占就业总人口的20~30%,发展中国家为12~18%,而我国只有4%。通过对国外各种灵活就业方式现状的介绍、分析可看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仅非全日制就业和临时就业就占到就业总量的30%多,再加上自营就业、独立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等其他就业形式,灵活就业总量可达就业总量的50%左右(平均值);在发展中国家,自营就业和家庭就业平均约为就业总量的55%,再加上其它灵活就业方式,灵活就业规模更相当可观。而且各种灵活就业几乎遍布于各产业、行业及各类职业,适用于各类不同层次的劳动者群体。这不仅说明各种灵活就业方式适用性很强,具有普遍意义和强大生命力,也说明国外劳动力市场灵活,具有宽广的包容性。我国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广泛推行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和弹性工作制,支持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从事各种劳务活动,以开拓出巨大的就业空间。目前,我国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关键在于转变劳动者择业观念,摒弃只有“正规就业”或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为了推行灵活就业,要深化用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灵活就业人员同样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免除后顾之忧。

稳定物价是“神秘四角”精准调控的操作杠杆

(节选)

物价渗透在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响着宏观经济肌体的健康运转。物价是体现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也是预示经济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标。价格总水平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是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把价格总水平作为政府四大调控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的重要条件。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看,使价格总水平适应经济增长要求,保持一个适当的上涨幅度,保持物价相对“稳定”,是促使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1、当前我国物价的基本态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的是城乡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在国际上通常被用作衡量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重要指标。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CPI自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下滑,并持续到1999年年末。在此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上升,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底,居民消费价格又持续下降14个月之久。今年第一季度CPI出现了0.5%的正增长,其中,城市和农村同时上涨了0.5个百分点。2003年1月到9月我国价格走势及特征表现为:(1)自去年底止跌转升以来,价格总水平出现了连续九个月的上涨局面。从与去年同月比的涨幅看,今年1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呈现先扬后抑走势,但居民消费价格则在波动中走高。(2)从构成看,在今年1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的2.4%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8%,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约2.7个百分点;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则下降了1.3%,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约0.3个百分点。(3)从居民消费八大类的价格走势看,今年1到9月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有食品、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四大类,其涨幅分别为2.2%、0.7%、1.4%和1.8%,均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0.8%、-1.1%、0.6%和-0.1%。(4)非典疫情对今年前三季度的价格走势影响不大。非典疫情在二季度曾一度引起了诸如鲜菜、食盐、醋、中药材和中成药、部分医疗卫生用品、旅游外出费用等消费价格的短暂波动,也引起了诸如维生素原药、维生素C、呼吸设备等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但是,自进入6月份后,上述商品和服务价格目前多数已恢复常态,加之这些商品和服务项目的权重很小,因此,其对价格总水平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2003年1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8.1%,是各类商品中上涨最高的,其次,是消费品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2%,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2%。在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上涨10.8%,鲜菜价格上涨19.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2.4%,油脂价格上涨27.2%,鲜蛋价格上涨16%,水产品价格上涨2.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食品价格是带动CPI高涨的主要原因。从国际环境看,中东局势逐渐趋于稳定,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缓慢复苏,为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可能。从国内环境看,国家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将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投资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惯性增长,需求拉力仍将持续;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信贷消费的规范,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信心,最终有望推动消费需求较快增长。因此,展望2004年我国的价格形势,既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又面临着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

2、如何正确看待和判断当前我国物价“上扬”

2003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去年同月上涨1.8%，到11月份CPI上扬到3%。

如何看待当前快速上升的物价指数？是否要重新看待和评价我国经济运行状况？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结束通货紧缩局面，快速步入通胀时期呢？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进出口占到我国GDP的60%，而世界经济目前依然处于“通缩”状态。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从大环境来判断，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进入“通胀”时期。在我国整体经济总体供需关系格局和世界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下。2003年全年的CPI上涨总体水平，应该在1%-2.0%左右，预计2004年也不会太高。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看待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突升。

当前物价回升的主要原因既有成本推动，又有需求拉动；既有内生因素，又有外生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1）今年经济增长的明显回升。尤其是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强劲增长，对铁矿石、原油、棉花、钢材、水泥、部分有色金属、电力等的消费大量增加，导致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回升。（2）当前的价格上涨是在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投放超常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贷款明显加快，全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18475亿元，远远超出年初计划的规模。（3）国际市场的粮食、原油、部分有色金属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是造成当前物价回升的重要原因之一。（4）当前的价格上涨是建立在去年同期价格较低基础上的。以2000年价格为100的居民消费价格指定基指数，从2002年1月份的100.5迅速下降到2002年7月份的98.1，从8月份开始又有所反弹。2002年前9个月价格指定基指数的均值仅为99.6，明显低于今年前9个月的100.3。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神秘四角”精准调控的外部支撑

（节选）

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历史经验，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立为宏观调控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此，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从宏观上来看，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对外均衡目标，而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则是对内均衡目标。中国加入WTO之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确保国际收支平衡在国民经济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持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仅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而且在本质上必然是一致的。只有内外兼顾、协调统一，才能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基本状况分析

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较快增加，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既是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取得明显成效的结果，同时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35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104%；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323亿美元，比2001年下降7%；年末外汇储备2864亿美元，比2001年末增加742亿美元。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8.2773元人民币/1美元，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2年货物贸易顺差442亿美元，增长30%。其中，出口3257亿美元，增长22%；进口2815亿美元，增长21%。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是推动经常项目顺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二是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增加。2002年，服务贸易项下收入397亿美元，增长19%；支出465亿美元，增长18%；逆差68亿美元，增长14%。服务贸易中的主要项目变化情况是：运输项目逆差79亿美元，逆差上升18%；旅游项目顺差50亿美元，上升28%；保险项目逆差30亿美元，逆差上升22%；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项目逆差30亿美元，逆差上升63%。三是收益项目逆差减小。2002年，收益项目收入83亿美元，下降11%；支出233亿美元，下降18%；逆差149亿美元，下降22%。四是经常转移顺差增加。2002年，经常转移收入138亿美元，增长51%；支出8亿美元，增长28%；顺差130亿美元，上升53%。引起经常转移顺差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个人来自境外的侨汇收入增加。

其次，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略有减少。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投资顺差扩大。2002年，直接投资顺差468亿美元，上升25%。其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8亿美元，下降60%；外商来华直接投资527亿美元，增长13%。二是证券投资仍呈现逆差。2002年，证券投资逆差103亿美元，下降47%。证券投资呈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不断增持境外证券。三是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2002年，其他投资逆差41亿美元，2001年为顺差169亿美元。其他投资呈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金融机构拆放境外同业和存放境外同业的金融资产有所增加；二

是企业境外融资回流境内资金减少；三是外债还本金额高于新借金额，2002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1685亿美元，比2001年末减少16亿美元。

第三，储备资产较快增加。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2002年，我国国际储备资产增加755亿美元，比2001年多增加282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资产增加742亿美元，比2001年多增加277亿美元。

第四，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贷方。2002年，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贷方，为78亿美元，占国际收支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的1.28%，处于国际公认的5%的合理范围内。

2、2003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动的新趋势

中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之间长期严重失衡，已经导致收益项目的巨额逆差，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对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国际收支整体状况来看，顺差和逆差都是国际收支的失衡，影响着一国的经济运行、资源配置、资金运用乃至经济伙伴国的相关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国际收支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但其隐含的负面因素亦不可忽视。因此，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动的趋势和特征，以便及时制定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首先，经常项目顺差下降：自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以来，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且从1997年开始快速增长，从1996年的72.34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297.17亿美元，到2002年已达到354.22亿美元。2003年上半年，经常项目仍保持了111.20亿美元的顺差，但顺差额同比下降了18%，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贸易顺差大幅下降。2003年，受国际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放缓和外部需求的约束，出口增长率低于去年，从进口看，随着中国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逐步取消非关税限制，以及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内在需求，进口将会保持增长。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导致货物贸易顺差下降，这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的主要原因。二是服务贸易项目逆差扩大。2002年服务贸易项下收入397亿美元，增长19%；支出465亿美元，增长18%；逆差68亿美元，增长14%。2003年上半年，逆差额为62.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14%。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加入WTO后，相关服务业已逐渐开放，而中国国内服务业总体水平存在的差距，以及中国涉外经济发展对国外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这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逆差上升势头。

其次，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激增：2003年上半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达到444.03亿美元，同比增加263%，比去年全年的顺差额322.91亿美元还多。该项目顺差额的超常增长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严重失衡。至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366亿美元，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仅2002年就增加493亿美元。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1.1，其中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1.03，而中国2002年该比例为1：0.05，这些充分显示了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不对称，应引起注意。东南亚各国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对称，出现投资项目中顺差数额的增加，加剧了经常项目赤字，并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从长远看，国际直接投资适当对称和协调发展是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之间长期严重失衡，已经导致收益项目的巨额逆差，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危及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和平衡，并对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其他投资项目由逆差向顺差转变。2002年该项目逆差41.07亿美元，而2003年上半年，顺差额已达到217.95亿美元，这与本外币利率差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无关系。如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和美元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分别为1.98%和0.56%，利差达1.42个百分点。其他投资账户差额的大增以及方向的转变值得关注。

第三，误差与遗漏账户贷方余额：2002年，该账户首次出现贷方余额，从2001年的-48.55亿美元转为2002年的77.94美元，2003年上半年贷方余额高达47.31亿美元。这意味着以前国际收支中反映出的资金净流出现象，现在已经变成了资本净流入，这种资本净流入不排除国际游资的存在，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膨胀。在中国资本项目处于管制的条件下，国际游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汇率的冲击：央行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将不得不一方面通过冲销措施购买外汇资金增加本币供给，另一方面需要压低人民币利率。两者的结果使得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金融调控能力减弱。国际游资进入国内，使中国资本项目长期以来注重于控制资本流出，而不是资本流入的金融监管政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四，外汇储备增幅较大：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2年全年增加742.42亿美元，而2003年上半年就增加了602.55亿美元。截至2003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839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有两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是中国外汇储备是靠大量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来支撑的。例如，1995年外汇储备增加219.77亿美元，其中经常账户顺差只有

16.18亿美元；2003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602.55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为111.20亿美元。这种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获得的外汇是债务性的，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二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高速增长并存。外债余额从1994年的928.1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685.4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外债余额的比重骤增，由1995年的70.9%，上升到2002年的111%，远超出国际上公认的30%的标准，这造成了外汇储备长余很多和以较高成本对外举债同时并存的严重的外汇资源浪费现象。

关闭

|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中国人口信息网